

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

傅 兴 林

摘 要 诸葛亮之所以选定汉中作为自己的归宿,实缘于汉中在诸葛亮的临终意念中的突出价值和作用。汉中是忠魂守护蜀汉的战略重地,是失意英雄醉卧疆场的理想归宿,是权臣忧患意识中的避风港湾。这即是诸葛亮死犹钟情汉中的多维复杂心态。

关键词 诸葛亮 墓地 汉中 心态 归宿

公元 234 年秋 8 月,在北伐前线的五丈原军营中,蜀汉丞相诸葛亮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临终,他对自己的归葬之地做了明确指示:“葬汉中定军山。”^①南征北战、劳苦功高的一代能臣贤相在其谢世以后为何不归葬成都以陪侍先主却要自择墓地于汉中呢?对这一看似单纯实则包蕴复杂心态的问题,笔者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探讨,以期昭示诸葛亮死犹钟情汉中的个中真谛。

一、忠魂守护蜀汉的战略重地

汉中地处秦巴山间,北倚秦岭,南界巴山,叠嶂夹峙,山险路艰。无论是穿越秦岭南下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抑或是纵跨巴山北上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无一不是以汉中为终端,并在其制控之下。南宋抗金名将张浚曾赞叹道:“汉沔为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②区区弹丸之地在泱泱中华帝国的版图上看似微不足道,但在风云际会、称雄割据时期却显得如此举足轻重。公元 215 年至 219 年,短短几年间,汉中狼烟滚滚,杀声遍野,三易其主。何以号称“天下英雄”之“使君与操”^③要拼死强夺此地呢?占据汉中,自秦川而南,蜀郡而北,即可上通下达,扼险兴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反之,一旦汉中失守,秦岭、巴山的两道天然屏障,便会拱手于敌方。其结果,对曹魏来说好比低位截肢,对蜀汉来讲则如患脑震荡。由此可见,汉中在争霸天下的三国时期所具有的超常军事战略意义。

早在隆中献策之时,尚未出山的诸葛亮就已将形胜之地的汉中纳入其钳击战略的总体规划圈中。既然要“西和诸戎”、“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④,若撇开汉中这个中转站、支撑点,那么要完成荆州——益州——中原式的三级跳,岂非痴心妄言?如此说来,汉中这块地盘在诸葛亮的心目中早已存在并占据着突出位置,而汉中之战的幕后总导演也正是其人。

随着荆州的失陷,汉中的战略要义骤然暴涨。曹魏想要吞灭蜀汉,必取道汉中,而蜀汉

想要北伐曹魏，也只余此路。因此，能否固守汉中，对蜀汉可谓生死攸关。迫于严峻的形势——“若无汉中，则无蜀矣”^⑤，身为蜀汉总设计师的诸葛亮只得派重兵防守，并在其生命的最后8年里，亲临前沿，坐镇汉中。

正因汉中的得失对蜀汉的存亡显得如此重要，正因拥据汉中直接关联着能否北伐并获得成功的一丝微茫希望，因而，汉中便成为诸葛亮临终意念中难于搁置的突出亮点。肯定地说，诸葛亮清醒地意识到，倘若弱小的蜀汉疏忽或不尽全力镇守汉中，整个蜀国将会陷入怎样的困境和结局。基于“图王业者，必得其地”^⑥的智识，基于尽忠尽责的护蜀理念，诸葛亮遗命将其骸骨葬于汉中，其良苦用心即是以自己丞相尊躯铸就一座岂容忽视的凝重丰碑，以强化蜀汉君臣对汉中的重视度，并长久警示将士坚守蜀汉的北大门——汉中。可以说，诸葛亮慎重地以自己的身价为筹码，巧妙地利用民心爱之的心理，最后一次向蜀汉军民敲响了非高度重视汉中不可的警钟。

二、失意英雄醉卧疆场的理想归宿

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⑦。高蹈长啸隆中时，“俊杰”、“卧龙”的美誉，使其自视甚大、期许颇高。在与朋友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畅谈未来时，他曾毫不隐瞒地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的仕进前景时，“但笑而不言”^⑧。不屑与道的深沉笑意背后，分明潜藏着非常人俗士可与伦比的鸿鹄大志。他期望成就如春秋时期齐国辅臣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⑨的盖世英名，期盼建立如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攻城略地、“意兼天下”^⑩的不朽霸业。因此，他“自比于管仲、乐毅”^⑪，以此来显现他心存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和功利雄心。此时的诸葛亮正值扬名蓄势、谋求善价的自贵自大时期，故当刘备枉驾顾请，他便欣然“许先帝以前驱”^⑫，拉开了他实质性创业的序幕。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最能体现英雄胆略和气魄的莫过于战赤壁、平南蛮、伐中原。而他籍此所要实现的不仅仅是辅佐刘备“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⑬，更在于充分建构其个人的价值体系。

当阳败溃，诸葛亮临危受命，只身游说东吴，最终促成孙刘联手、北拒共制的统一战线。赤壁烈火，销尽曹操锐气，江南因之而初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末路英雄刘备方余生虎口，并大获渔翁之利，抢占到他奔波半生未曾真正拥有过的赖以生存和图谋发展的立足之地——荆州。煽起赤壁战火并趁乱瓜分荆州，诸葛亮功不可没，这奠定了他事业的良好开端，第一次有力地证实了他的睿智和魄力，显现了他加盟刘备阵营的价值和作用。

建兴三年，诸葛亮冒险深入“不毛之地，疫疠之乡”^⑭，采用武攻心战的策略，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彻底荡平了两三年间的南中叛乱势力。此次出兵，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全面胜利，而且根绝了政治上可能反复的隐患，为日后能全力以赴大举伐曹营建了稳固的后方阵营。虽说此战的军事价值逊于其政治意义，但对诸葛亮本人来说，却是他有史以来身临前线、自主定夺的“处女作”。它验证了诸葛亮治军作战的能力，并再度以其成功的鼓动性带给他极大的自信心，成为支撑他坚信北伐亦能如愿以偿的潜意识佐证。不妨这样说，平复南中在诸葛亮深层意识中便是北伐的前奏曲和练兵用武的试金石。

诸葛亮是死忠于汉皇室的“清流派”传人，这决定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⑮成为其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如果说回报刘备的知遇和托孤是一种感性的外驱力，那么“攘除奸凶，兴复汉室”^⑯则是一种理性的内动力；如果说赤壁大战、南中之征是诸葛亮小试其神

勇,那么,北伐曹魏则是他尽显神武能量的总爆发。战荆州、抚夷越均以其成功的结局印证了隆中的部分预言,北定中原的奇迹是否也应遵循部分而趋全盘的正常逻辑走向?或许诸葛亮自信度过大而导致的期望值太高,或许追求不到古代先贤的丰功伟绩难令他心甘、心安,抑或许当代豪杰曹操、周瑜以少胜多的战绩左右、支配着他要刻意仿效并务欲胜之,在兵凋民疲的客观现实下,诸葛亮仍挫而不折地孜孜以求而不愿割舍,他始终不甘于雄心无果、奇迹未现的现状。然而,逆动的历史向诸葛亮展示了它的残酷性,“无功而还”的结局辜负了他竭诚尽虑的心血。自认为正义事业的失败降下了悲剧的帷幕,中断了诸葛亮预测的逻辑线,沉重地宣告了他主观预见的可疑性和主观意识的非真理性。

可以想象,诸葛亮的弥留之际,是他一生中最为伤感的时刻。他亲手绘制并亲身躬行的宏图被无情的历史所撕碎。自青少年时期就充满信心的他,在历尽艰辛的最后关头,并未能目睹到他渴求已久的理想结局。曾几何时的辉煌光彩,嘲弄了试图再度辉煌的雄心;永不衰竭的战斗热忱错筑成眼下难以接受的莫大悲哀,空前的沮丧和失望以及“不效,则治臣之罪”^{①7}的承诺凝聚成“此魂何甘归故土”^{①8}和“无颜见江东父老”^{①9}的极度伤痛。被逼到绝境的诸葛亮,虽知“是处青山可埋骨”^{②0},但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汉中这片火热的战土成全了具有军人气质的失意英雄。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乃是军人所崇尚的理想归宿。当我们吟咏“古来征战几人回”^{②1}这样的豪迈诗章时,难道会寞然而无丝毫的景仰与崇敬?因此,成此壮举,虽死犹荣。传统军人所具有的悲壮美感,化解、清洗并升华了失意英雄壮志未酬、有根难归的悲伤色彩,将其幻化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2}的永久光环,为诸葛亮战赤壁、平南中、伐中原的英雄军旅生涯划上了一个颇富神韵的动人句号。由此来看,诸葛亮归葬汉中,便死得其所。

三、权臣忧患意识中的避风港湾

诸葛亮自追随刘备出山入仕,宦途可谓“稳中有升”。白帝托孤,是忠臣兼能臣的他于刘备时期博得的最大殊荣和最高信任。刘备的临终教诲——“父事丞相”^{②3},迫使弱小的刘禅“委以诸事”并听任“政由葛出”^{②4}。自此,“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②5},形成了握有尚方宝剑的诸葛亮总揽大权的政治格局。突出地体现出诸葛亮位高权大威慑力的应属北伐期间。出师前,诸葛亮对人事作了周详的安顿,并对刘禅明确示以担心和告诫:宫中、营中“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②6}。表面上是上奏章,而实质上无异于下圣旨。至诸葛亮去蜀北伐,他所擢拔的亲信,实担当着一切朝堂大任。因此,“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②7}如此被架空、搁浅的刘禅,丧失了生杀欲夺的大权,唯画诺而已。皇帝的尊严和威仪其实已被诸葛亮暗中嫁接于己身。

诚如是,诸葛亮不是成了好权僭越的不忠之臣了吗?不然。事实上,诸葛亮之所以捆束刘禅的手脚,剥蚀其皇帝的大权,却恰好源于其忠君忧国之心。就当时情形而论,刘禅暗弱,无识无断难振将倾之大厦,倘若诸葛亮不集权挽危,一旦奸佞当权,蜀汉衰亡自不待言,此其一。刘备临终,将军国大事托付于诸葛亮,如此受命厚任,非效忠继死不能报其恩。成大事者,若无便宜之权而处处受制于人,岂有成功之理?此其二。因此,诸葛亮总权使威正如其言是“以报先帝,而忠于陛下之职分也。”^{②8}

然而,善意的心愿未必会获得善意的理解。诸葛亮自觉任重而道远,时不我待的焦虑感、紧迫感,敦促着他誓欲在有生之年成就伟业。急功报恩之心所采取的操纵军国之举,引

起了持异议者的诋毁、肘制。刘禅对此,虽未明言,但其骨子里定然误解、曲解而有所不满,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暂时忍气含忿罢了。诸葛亮殉国后,刘禅的所作所为明确地逆证了他的隐幽心理。在“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的哀悼呼声中,“后主不从”^⑨。何以相父去世,刘禅会有此冷酷之态呢?追其因,实归咎于威高震主。刘禅违逆人心的冷寞乃是其十足的泄愤之举。

在中国 5 千年的文明史上,因威高震主遭致贬窜乃至杀身灭亡之祸的,俯拾即是。扭曲的封建王朝礼制,一面为志士入仕建功、翊戴王室构筑着进身献忠的云梯,一面却又为无数威镇凶暴的治世功臣挖掘着自毁败亡的坟墓。商纣杀比干,吴王戮伍子胥,……忠烈的史册,满浸着忠臣的鲜血,充塞着功臣的寂寞。曾统帅三军、威风凛然、为汉朝打天下建奇功的韩信,不也是因刘邦所忌,终致身首两分吗?“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飞,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⑩韩信的幡然醒悟,提炼出封建皇帝残酷而暴虐的本性,揭示出志士仁人悲凉而凄惨的心态。有鉴于此,洞幽显微的诸葛亮在临终之际,岂能绝无他个人积郁的忧患意识?

当然,运尸回蜀,刘禅或许碍于礼制和相父的身份,并不会将其尸骸怎样。但人走茶凉、虎死威消的炎凉世态是否会骤然招致嘲讽、冷遇,甚至倒戈一击呢?与其身后强人难为情,与其陷入不尴不尬的境地,倒不如停泊于汉中这个宁静的港湾以躲避兴风作浪的潮头,以富含积极意义的自择墓地来便人壮己,以相隔千山万水的丞相亡灵逗起更多的遥思远念,以自葬僻地的透骨悲凉来冲淡所有可能生出的怨诟。汉中这片瘠土就这样掩埋了忠魂烈魄的难言之隐!

人总有一死,无论谁都难免一抔黄土掩其尸。然而,在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有谁的葬身之地对一个国家的存亡发挥着如此特殊的作用?又有谁象诸葛亮这样在与一切诀别时显得如此心事重重?又有哪一位高居在位的丞相甘心自葬于穷乡僻壤?既矛盾又谐协的复杂心态,无从回避地凝结成理智却又无奈的同心圆,掩藏在汉中这块成人之美的地下。这或许正是做为古代标本型知识分子的诸葛亮至大至悲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⑦⑪⑤《三国志·蜀志·诸葛亮》

②《勉县新志·形胜》

③②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④《隆中对》

⑤《三国志·蜀志·杨洪传》

⑥王夫之《读通鉴论》

⑧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

⑨《史记·管晏列传》

⑩《史记·乐毅列传》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前出师表》

⑳《三国志·蜀志·王连传》

⑮②《后出师表》

⑮ 见勉县武侯墓楹联“未定中原,此魂何甘归故土;永怀西蜀,饮恨遗命葬军山”。

⑮⑨《史记·项羽本记》

⑮⑩苏轼《狱中遗子由二首》

⑮⑪王翰《凉州词》

⑮⑫《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引《魏略》

⑮⑬《三国志·蜀志·费伟传》

⑮⑭《襄阳记》

⑮⑮《史记·韩信列传》